

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。”李商隐的《咏史诗》足够警策。

在勤俭方面，曾国藩看得尤为透彻：天下官宦之家，“其子孙始而骄佚，继而流荡，终而沟壑”，福泽往往只够一两代人享用就枯竭了；富商巨贾之家，勤俭者能够延续福泽三四代；耕读之家，谨朴者能够延续福泽五六代；孝友之家根基最牢，则可以绵延福泽八代十代。

事实胜于雄辩。在掌舵人曾国藩的引导下，曾氏家族沿着耕读孝友的路线稳健进发，曾家人后人不乏成名成家者，却少有政客，以学者、教育家居多，至今也没有偏离航向。一百多年家声不坠，放眼全国，这般福泽源远流长的大家族也是屈指可数。

在家书中，曾国藩叮嘱子弟不可忘本，讲的全是实在话：“吾家子弟半耕半读，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。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粪等事，须一一为之；插田莳禾等事，亦时时学之……至要至要，千嘱万嘱！”大户人家的子弟就怕经受不住欲望的蛊惑，“黄金壮起荒淫志，千百锭买张招状纸”，终至败身而毁家。曾国藩开出的验方是以勤敬克骄惰、以俭朴克淫逸，家中子弟就算只能做到六七分的样子，效果也是顶好的。

曾国藩用家书多次敲打国潢、国荃两位老弟，因为曾国荃酷爱做面子工程，在老家筑大祠堂，建大宅院。同时期内，湖南有多位督抚大臣，曾家立此先例，实有不妥。曾国藩提醒曾国潢：“沅弟有功于国，有功于家，千好万好，但规模太大，手笔大廊，将来难乎为继。吾与弟当随时斟酌，设法裁减。”曾国潢有其优点，爽直、廉明，也有其缺点，手松不俭，爱热闹，爱招待人客，曾国藩便对症下药：“以后望子弟‘俭’字加一番工夫，用一番苦心，不特家常用度宜俭，即修造公费，周济人情，亦须有一‘俭’字的意思。总之，爱惜物力，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。莫怕‘寒村’二字，莫怕‘悭吝’二字，莫贪‘大方’二字，莫贪‘豪爽’二字。”相比曾国荃，曾国潢的表现算不错了。老兄经常敲打敲打，肯定没坏处。

曾国藩有个清醒的认识：“居官不过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长久之计，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矩，虽一旦罢官，尚不失为兴旺气象。若贪图衙门之热闹，不立家乡之基业，则罢官之后，便觉气象萧然。”如何齐家，如何让子孙能勤能俭，这始终是曾国藩覃思精研的重要课题。

曾国藩还有另一个清醒的认识：“家中要得兴旺，全靠出贤子弟，若子弟不贤不才，虽多积银、积钱、积谷、积产、积衣、积书，总是枉然。子弟之贤否，六分本于天生，四分由于家教。”于是四分功德，曾国藩苦口婆心、不厌其烦地训导子弟勤克勤俭，不可懒惰奢靡。他极力提倡“勤、俭、刚、明、忠、恕、谦、浑”八德，“勤”“俭”赫然排在八德的首位和次位。

这并不奇怪，居高位、享厚禄的人大力提倡勤俭。北宋大臣、史学家司马光暮年教诲儿子司马康，惯用八字方针：“俭以养德，清以修身。”大文豪欧阳修与司马光同时代，他毕生念念不忘的母训也是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。明末理学家朱柏庐著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，把道理讲得深入人心，那句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堪称顶级格言。

曾国藩从小受教于祖父曾玉屏（星冈公），牢记其嘉言实行。曾玉屏年少时游手好闲，后来幡然悔悟，专心讲求农事，开垦梯田，种谷种菜。进门喂猪，出门养鱼，亲力亲为。“凡菜茹手植手撮者，其味弥甘，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，食之弥安也。”在曾国藩的心目中，星冈公是第一偶像，曾氏家规即源于曾玉屏的八字教诲：“早、扫、考、宝、书、蔬、鱼、猪”。起早床，打扫屋子，敬奉祖先，亲睦邻里，读书，种菜，养鱼，喂猪。曾国藩将“未明求衣”视为要緊事，“一生之计在于勤，一日之计在于晨”，均非早起不可。他在家书中叮嘱道：“书、蔬、鱼、猪，一家之生气；少睡多做，一人之生气。勤者生动之气，俭者收敛之气。有此二字，家运断无不兴之理。”

曾家无懒汉，八字祖训的确落在实处。

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春节，曾国藩回复弟弟、部将彭毓橘，专挑“勤俭谨信”四字勉励他：“勤如天地之阳气，凡立身居家，做官治军，皆赖阳气鼓荡。勤则兴旺，惰则衰颓。勤者可以正风气，可以惜后福。谨即谦恭也，谦则不遭人忌，恭则不受人侮。信即诚实也，一言不欺，一事不假，行之既久，人皆信之，鬼神亦钦之。”别人贺岁，多半写几句陈言套话，曾国藩却代之以谆谆教诲，君子爱人以德，赠人以言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次年元宵节，二更后，曾国藩读《戴东原文集》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偶思大丈夫之不旋踵而败，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。所以致败之由，大约不出数端。家败之道有四：曰礼仪全废者败、兄弟欺作者败、妇女淫乱者败、子弟傲慢者败。身败之道有四：曰骄盈凌物者败、昏惰任下者败、贪刻兼至者败、反复无信者败。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。”诚然，自古以来，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，多半是由于子弟骄奢淫逸所致。人们都知道症结在哪儿，可就是无可奈何，曾国藩总结出“家败之道”和“身败之道”共八条，他的对症之药究竟有哪些呢？

先看曾国藩的诗句：“富贵绮罗遭鬼瞰，忧患可以坚筋骸。”他有感于大学士周祖培教子无方，日记中写下精辟之论，大意是：夜间接到周中堂的儿子周文翕的感谢信，错别字很多，字迹恶劣不堪，大概是门客代笔，主人全未过目。我听闻周少爷平日目高于顶，喜欢信口雌黄，而妄事办得如此潦草，极为可叹。达官人家的子弟，听惯了高谈阔论，见惯了大排场，往往轻慢师长，讥讽他人的短处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骄”。由骄而奢而淫而佚，以至于无恶不作，都是从“骄”字生出的弊病。豪门子弟的骄纵，又多半由于父兄得运乘时，侥幸成为了达官贵人，便忘记自己本领不高，学识谫陋，自骄自满，以至于子弟效仿其傲慢而不知不觉。我家子弟辈，也多有轻慢师长、讥讽他人短处的恶习，欲求稍有成立，必先根除这种恶习，努力戒断这种骄矜之气。要禁断子弟的骄矜之气，我先要以身作则，戒防内心的自骄自满，为此我愿终身自勉。

戒骄戒傲乃是达官本身及其子弟的首要任务。何以克骄？曾国藩给出的解药竟是一个“愧”字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，便是载福之器、入德之门。如觉天之待我太厚，我愧对天；君之待我过优，我愧对君；父母之待我过慈，我愧对父母；兄弟之待我过爱，我愧对兄弟；朋友之待我过重，我愧对朋友，便觉处皆有善气相逢。如自觉已无愧无作，但觉他人待我太薄，待我太啬，则处处皆戾气相逢。德以满而损，以骄而减矣。”以“愧”克“骄”，这味解药能否收到立竿见影之效？芸芸众生如何往“愧”字上用足工夫？一要扪心自问，二要反躬自省，毕竟短缺良知并不像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令人受饥犯窘。

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春节，曾国藩回复弟弟、部将彭毓橘，专挑“勤俭谨信”四字勉励他：“勤如天地之阳气，凡立身居家，做官治军，皆赖阳气鼓荡。勤则兴旺，惰则衰颓。勤者可以正风气，可以惜后福。谨即谦恭也，谦则不遭人忌，恭则不受人侮。信即诚实也，一言不欺，一事不假，行之既久，人皆信之，鬼神亦钦之。”别人贺岁，多半写几句陈言套话，曾国藩却代之以谆谆教诲，君子爱人以德，赠人以言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次年元宵节，二更后，曾国藩读《戴东原文集》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偶思大丈夫之不旋踵而败，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。所以致败之由，大约不出数端。家败之道有四：曰礼仪全废者败、兄弟欺作者败、妇女淫乱者败、子弟傲慢者败。身败之道有四：曰骄盈凌物者败、昏惰任下者败、贪刻兼至者败、反复无信者败。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。”诚然，自古以来，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，多半是由于子弟骄奢淫逸所致。人们都知道症结在哪儿，可就是无可奈何，曾国藩总结出“家败之道”和“身败之道”共八条，他的对症之药究竟有哪些呢？

先看曾国藩的诗句：“富贵绮罗遭鬼瞰，忧患可以坚筋骸。”他有感于大学士周祖培教子无方，日记中写下精辟之论，大意是：夜间接到周中堂的儿子周文翕的感谢信，错别字很多，字迹恶劣不堪，大概是门客代笔，主人全未过目。我听闻周少爷平日目高于顶，喜欢信口雌黄，而妄事办得如此潦草，极为可叹。达官人家的子弟，听惯了高谈阔论，见惯了大排场，往往轻慢师长，讥讽他人的短处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骄”。由骄而奢而淫而佚，以至于无恶不作，都是从“骄”字生出的弊病。豪门子弟的骄纵，又多半由于父兄得运乘时，侥幸成为了达官贵人，便忘记自己本领不高，学识谫陋，自骄自满，以至于子弟效仿其傲慢而不知不觉。我家子弟辈，也多有轻慢师长、讥讽他人短处的恶习，欲求稍有成立，必先根除这种恶习，努力戒断这种骄矜之气。要禁断子弟的骄矜之气，我先要以身作则，戒防内心的自骄自满，为此我愿终身自勉。

戒骄戒傲乃是达官本身及其子弟的首要任务。何以克骄？曾国藩给出的解药竟是一个“愧”字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，便是载福之器、入德之门。如觉天之待我太厚，我愧对天；君之待我过优，我愧对君；父母之待我过慈，我愧对父母；兄弟之待我过爱，我愧对兄弟；朋友之待我过重，我愧对朋友，便觉处皆有善气相逢。如自觉已无愧无作，但觉他人待我太薄，待我太啬，则处处皆戾气相逢。德以满而损，以骄而减矣。”以“愧”克“骄”，这味解药能否收到立竿见影之效？芸芸众生如何往“愧”字上用足工夫？一要扪心自问，二要反躬自省，毕竟短缺良知并不像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令人受饥犯窘。

家声不坠

藩从京城致书家中诸弟，观点鲜明：其一，做官靠贪赃受贿发大财是可耻的，他不屑为之；其二，他乐意拿出一部分积蓄的廉俸周济亲戚族党中的穷困者，而非悉数留给子孙；其三，兄弟之爱，手足之情，惟之以德，不欲爱之以姑息，只想教之以勤俭，劝之以习劳守朴。曾氏家风，似春日里的细雨，穿透时空，无声地滋润人间……

清朝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春，曾国

勤俭刚明
忠恕谦浑

勤俭刚明

湘军大本营和两江总督署移驻安庆后，湘乡老家一亲戚千里迢迢到安徽投靠湘军大帅、两江总督曾国藩，他行李简单，衣服上还打了一块补丁，人前少言寡语。曾国藩见他质朴本分，打算让他随军当差。有一天，他与这位亲戚同桌吃饭，饭里面有几粒稗谷，这个亲戚一一挑拣出来，排放在餐桌上，显得格外扎眼。曾国藩没说话，也没皱眉头，饭后不久，即备好川资，把这个亲戚叫来，安排他明天回家。这个亲戚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说错了什么话，还是做错了什么事，心里感到委屈，就满眼疑惑地望着曾国藩，急于弄明白自己不受待见的缘故。曾国藩也不想让他犯着嘀咕回家，就告诉他：“今天吃饭的时候，你从碗里挑去稗谷，这个举动很反常。你既不是有钱人，又未曾做客于外乡外地，放下家中的农活来到军营，才不过一个多月，就开始挑三拣四，湘乡老家的人怎会如此挑剔？我担心你出了家门就忘本，留下来在军营里当差，反而有害无益。”朴实的本质可能会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曾国藩对此警惕性很高。湘乡亲戚吃饭时挑拣稗谷本是小事一桩，但这个苗头不好，所以曾国藩改变主意，打发他回家务农。

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曾国藩的食单：“每餐二肴，一大碗，一小碗，三蔬，凡五品……”两荤三素，相当清俭，可见曾国藩不是贪享口福之人。赵烈文还发现曾国藩的常餐中没有鸡鸭，就问他是否吃火腿。曾国藩回答说，厨房没有火腿，以前有人送过，他一概不收，后来就没人再送了。他喝绍兴黄酒，也只零沽，不买整坛的。家用食具皆为陶器。赵烈文感叹道：“大清二百年，不可无此总督衙门！”赵烈文赋诗《奉怀湘乡相侯师》，其中有句“木榻风灯一老儒”，纯属写实风味。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夏，曾国藩写信告诉儿子曾纪泽，他晚饭只吃肉汤炖蔬菜一二种，味美无比，菜不必贵，适口则养人。

曾国藩不仅以曾家子弟的骄惰为虑，也以曾家妇女的奢逸为虑。
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夏，曾国藩为夫人、儿媳和女儿制订功课单，翌日附上16字口诀：“家勤则兴，人勤则健，能勤能俭，永不贫贱。”功课单中，分为“食事”“衣事”“细工”“粗工”四类，均须定期抽检。

欧阳凝祉是曾国藩的恩师和岳父，坐馆课徒，舌耕40余年，疏于治生，临财不苟，谢绝馈赠。曾国藩的发妻是欧阳凝祉的长女，她粗通文墨，会下围棋，精于纺织，是一位实打实的贤内助，为曾家生了三子（一子夭折）六女（一女夭折）。据王闿运《湘绮楼日记》在光绪三年追记，欧阳夫人口碑极佳，久已跻身高官贤内助的名谱，以勤俭著称。

欧阳夫人非常能干，举一事为例：生曾纪鸿时，“断脐及一切事”都是她“亲手经理”。操持家务，教育子女，欧阳夫人的成绩单都很漂亮。曾国藩担心家人的“官念”难以断根，他写信叮嘱欧阳夫人：“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，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，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，则福泽悠久，余心大慰矣。”明明是封疆大吏的家人，却要他们忘掉这个身份，只安心过平民百姓的小日子，这是不是很困难？“家中妇女大小皆纺织，闻已织成六七机”，欧阳夫人带头示范，勤俭的家风蔚然而成。曾国藩幺女曾纪芬著《崇德老人自订年谱》，于闺门谨肃、家风俭朴多有涉笔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曾纪芬的三姊曾纪琛住在两江总督署，身边没有婢女使唤，从安庆花费十余吊钱买了一个小丫头。曾国藩知道后，大加申斥。“文正取家严肃守俭若此，她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婢媪也。”一品大员的媳妇和女儿必须自己梳头，在当年传为奇闻。

欧阳兆熊在其笔记《水窗春呓》中写

道：曾大帅驻节安庆时，欧阳夫人与大儿媳刘氏每晚都有额定的功课：纺纱四两，二更时分收工。某夜，欧阳夫人纺纱到了三更，曾纪泽已熟睡。欧阳夫人对媳妇刘氏说：“今天给你讲个笑话，醒醒瞌睡如何？”有位婆婆带领儿媳纺纱，到了深夜还不歇息，儿子怒骂纺车声震耳闹心，使他不得安眠，放出狠话，要击碎纺车。他父亲在房中应声唱和：“我儿可将你母亲的纺车一并击碎为妙！”

翌日清晨，曾国藩在餐桌上复述了欧阳夫人所讲的笑话，“座中无不喷饭”。总督夫人夜夜纺纱，不免令人咋舌，也令人大惑不解。两江地区的某位官员闻之赞叹不已，为了“破除官场家人骄惰之习”，他特意添置纺车，强迫自家夫人效仿，结果“终日不能成一纱”，化为笑谈。总督夫人崇尚俭朴可能是不得已的，有时候，欧阳夫人“手中竟无零钱可用”，实情就是如此，并非杜撰。曾总督天天为军饷匮乏犯愁，常以苏东坡的诗句“饥人忽梦饭匾溢，梦中一饱百忧失”解嘲，把钱都用到刀刃上去了，欧阳夫人贤惠，体谅夫君的不易，就只能想方设法开源节流。

曹操临死之际，仍口授《遗令》，念念不忘分香卖履。晋代名士陆机撰《吊魏武帝文》，对这位大奸雄“系情累于外物，留恋于闺房”不以为然，认为他罔识性命，过于纠结于细事。曹操与曾国藩都是“内圣外王”的典型人物，他们治国平天下时运用铁腕，心肠狠辣，未必可爱；他们的可贵之处体现在别的地方，勤俭就是其中之一。曾国藩官居极品，竟腾出心思来为媳妇、女儿制订“功课单”，遗嘱中吩咐儿子“谨守勤俭孝友家风”，这就难免会被某些高门大户的子弟嘲笑为“吃饱了饭撑的”。不管你是否喜欢曾国藩，只要你拥有一颗平常心，就不会对他这方面的言行嗤之以鼻。

插画
何朝霞

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十

月十一日，曾国藩48岁生日，曾国荃到南昌为兄长祝寿，午宴摆了九桌满汉席。饭后老兄送老弟上船，与他讲世家的可贵之处，不在于多置良田美宅，也不在多蓄书籍字画，而在于能够自觉树立子孙多读书、无骄矜习气。这番话明敲暗打，要老九戒奢戒骄。曾国藩不爱良田美宅，不重古董字画，这些恰恰是老九所爱重的。

同治七年正月间，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接沅弟信，知纪官侄于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，欣慰至。吾兄弟共得五孙，丁口渐盛，只望儿侄辈读书，少有所成，将来孙辈看作榜样，便是世家好气象。若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，文理不通，则榜样太坏，将来孙辈断难成立。此中关键全在纪鸿、纪瑞二人。吾家后辈之兴衰，视此二人为转移也。”这年，侄子曾纪官双喜临门，得子之后不久，县考得了案首（第一名），伯父曾国藩的喜悦溢于言表：“吾每虑吾子弟功名太盛，发泄殆尽。观近年添丁之渐多，子弟之向学，或者祖泽尚厚，方兴未艾，且喜且惴也。”三年后，侄子纪寿又取得县考案首。曾国藩屈指一算，曾家三辈人里已有九位考中过童生，八位得过县考案首，只有自己未能尝到案首的滋味，“上两辈皆极难，纪字一辈则得之稍易”。

唐朝贤相张九龄赋诗《感遇》，道是“美服患人指，高明逼神恶”。世家甚好，人言可畏。同治二年深秋，曾国藩致书四弟国潢，叮嘱再三：听说十月十九日家庙落成，将由县城叫省中戏班来庆贺。我认为我家正值鼎盛之际，此等地方总宜收敛，不宜过于发扬，望弟时时留心。嗣后，曾国藩听说湘乡荷叶塘家中四人大轿使用率高，驰书制止：家中坐轿的人太多，我听说纪泽也坐四人大轿，这万万不可。老弟何不严加教责？即便是老弟也只可偶尔坐一回，常坐则不可。当年的四抬大轿相当于今日之豪车，格外打眼。

高官子弟好虚荣，好炫耀，都不是好事，他们尝到甜头之后，就会得寸进尺，骄奢之后必然淫佚。曾国藩还做了一番横向比较：湖南现有总督四人，都有子弟在家，都与省城各署来往，都听说有谁坐四抬大轿的。我昔日任省城办团练，也从未坐过四抬大轿。由此推断，凡事都应当存有谨慎俭朴的定见。

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给四弟国潢，上联是“俭以养廉”，下联是“直而能忍”。曾国潢管理家业、襄赞地方公益均喜欢大手面，这就背离了曾国藩倡导的爱惜物力的寒士家风。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强调“莫怕‘寒村’二字，莫怕‘悭吝’二字，莫贪‘大方’二字，莫贪‘豪爽’二字”，还要求国潢在家见客不宜多，“总之，家门太盛，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”。对于老大的指示，老四不敢顶撞，多少有所收敛。老兄官位大了，老弟调子高了，时时处处顾体面讲排场，节俭就绝非一件容易事，曾国藩明知家中的娇夫、挑夫由三名增至十余名了，他还是力倡俭朴，要国潢牢记“有减无增”四字。他说：“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，总恐老辈失之奢，后辈失之骄。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。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，为后人惜余福，除却‘勤俭’二字，别无做法。弟与沅弟皆能勤不能俭，余微俭而不甚俭，子侄看大眼吃大口，后来恐难挽回。弟须时时留心。”后来，他有个更清晰的对比：“余于‘俭’字做到六七分，‘勤’字尚无五分工夫。弟与沅弟于‘勤’字做到六七分，‘俭’字尚欠工夫。”

在清代，耕读之家多半都爱做金榜题名的美梦。在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



六月初，曾国藩就给子侄定排行，以“甲科鼎盛”四字为序，每字10人，比如曾纪泽是甲三，曾纪鸿是科一。曾家确实成为了世家，子孙中出息了不少学者、科学家和教育家，他们留学的费用，多半靠曾国荃极其厚实的家底来支应。曾国藩提供的勤俭持家、质朴做人的精神衣钵，确保曾氏家族一百多年不衰微。二者的作用不可低估。

同治